

淞沪抗战：中国的主动进攻 与日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改变

——评军科院《中国抗日战争史》有关“淞沪会战”的论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张振麟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关于淞沪会战有几句总结性的评论：“淞沪地区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首都的门户，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虎视眈眈。中国无意把战争引向淞沪地区自伐肺腑，自损资源，以改变敌进攻方向，而是日本侵略者决意夺占上海。因此，在淞沪地区进行一战势必难免。”（中卷第152页）这段话显然是批驳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个论点：淞沪会战，中国把日本侵华战争的作战重心由华北引到了华东，使敌作战方向从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作者含蓄而又明确地反对这个论点，理由是“中国无意把战争引向淞沪地区自伐肺腑，自损资源。”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由于反对此一论点而无视或抹煞了国民政府淞沪抗敌的主动性和积极进攻，则是本书淞沪抗战部分中的一大缺陷。

说“日本侵略者决意夺占上海，因此，在淞沪地区进行一战势必难免”，即淞沪战争从根本上说来是日本侵略者挑起的，这是符合史实的，日本侵略、中国被侵略的总形势确是这样。但在这个总形势下，国民政府并没有束手等待敌人进攻或单纯消极防守，而是在判定敌人必定要发动侵略时，赶在敌人前面，部署并且实施了主动进攻。

7月30日，担任京沪警备司令官的张治中已向蒋介石等提出保卫上海应“先发制敌”之策。他在一道密电中说：当根据各种征候可断定敌将在上海发动无疑时，我军就应“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南京接受此策，复电说：“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8月11日,中央决心围攻上海日敌,令张治中率领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于当晚向预定之围攻线推进,“准备对淞沪围攻”。张立即执行了这个命令。

12日,张治中连电向蒋报告部署、准备情况,请示先发制敌、掌握主动,“可否于明(元)日拂晓前开始攻击?”蒋复电,要他“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致使张预定的进攻未能实现,反而发生日军的挑衅。“八·一三”沪战由此开始。

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同日,张治中决定并部署以杨树浦港以西至虹口日军司令部间为重点,对敌“猛勇攻击,进占其根据地”,乘其大量援军未到前将在沪之敌“压迫至苏州河及黄浦江而歼之”。从这时起到23日日军大批在吴淞口等处登陆为止,中国军队一直处于进攻地位,这是在总的战略防御中的对敌反进攻,是一种积极防御。

事实就是如此。

此书关于“八·一三”以前国民政府的“先发制敌”之策以及为实施此策而做的各种准备、部署完全略而不提,而笼统地说是“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并把“八·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国军队的进攻作战说成是“反击作战”(中卷,第142页)。这样就从根本上无视或抹煞了国民政府在上海抗战中的主动性、积极进取攻的精神和行动。

从“八·一三”前前后后中国的军事准备、部署、行动等等来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民政府是“有意”在上海开仗的,目的是及早把敌军消灭掉或赶出去。国民政府有一切理由这样全力保卫上海,这不是“自伐肺腑,自损资源”,而是为着自保肺腑,自护资源。

至于上海战争的扩大,虽然不尽决定于中国,中国也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8月20日,刚由上海视察回南京的陈诚向蒋介石汇报:“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

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他建议“向上海增兵”,得蒋赞赏。蒋即任他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这样向上海增兵、扩大沪战,以牵制日军在华北的进攻,为的是使日军不能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趋武汉,这里已包含了要改变敌军进攻方向之意。

8月20日,中国大本营颁发《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将全国分为四个战区,“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确认当时华北为主战场。同日,军事委员会颁发《国军战斗序列及作战指导方针》,提出“国军以一部集中华东,重叠配备,多线设防……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陆军根据地,阻止后续敌军之登陆,或乘机歼灭之;并以最小限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要地”。(有人说这是“一件以讹传讹的史料”,似觉武断。此《作战指导方针》见于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印的《抗日战史:全战争经过概要(三)》第255页,是可信的。)这里包含了要改变主战场之意。这个关于军力配置的方针得到切实的贯彻,中国军队的主力果然逐步集中到了淞沪战场。扫荡或歼灭敌军的目标虽未达到,但确实把侵华日军主力吸引了过来:日本不仅从其国内、从我国东北向上海调兵,也从华北抽调部队增援淞沪战场。到了10月间已形成这样的局面:华北数省广阔战场上日军减到7个师团,相对说来狭小得多的淞沪战场上日军增加到9个师团,淞沪战场取代华北成了日军侵华和中国抗战的主战场。这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日军的主攻方向,而这个改变是与中国政府决定向上海“增兵”、“以主力集中华东”密切联系的,怎么能断言中国“无意”呢?

淞沪会战结束后,陈诚追述这场战斗,明确讲到“我军之攻击精神”。他总结检讨沪战之失败,对此战的指导做了许多批评,但肯定“敌主力已被我诱致该方面”,此战“转变了敌‘沿平汉(路)南下’之原定计划”,是为淞沪抗战的一个收获。

这里有一个问题,日军当初到底有没有一个“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的计划?有人认为,日军根本没有这样的计划,因此也就

谈不到改变不改变的问题。的确,迄今为止,还没有从日方资料中发现这样的计划的证据。但日本没有这样的计划并不能否定中国担心它有这个计划。国民政府当时确实担心华北日军迳行南下夺取武汉,陈诚同蒋的对话就反映了这种担心。实际上,不只国民政府方面有人有此担心,中国共产党也有此估计。1938年2月23日(淞沪会战结束、南京失守之后,徐州会战之前)中共中央有一个《关于保卫西安、武汉的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里面关于“敌情判断”的第一段话就是:“敌为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如果说战争进行7个多月之后,中共还判断敌军要南下夺取武汉,而设计防卫之策的话,那末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有此担心而谋以扩大沪战牵制之,就更可以理解,更应该肯定。此书叙述淞沪会战的经过,提到国民政府“决定以主力集中华东”,然后说到,“日军决心将侵华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向由华北转移到上海”,到了10月“侵华日军的作战重点,已经转移到华中”,等等,却又说“中国无意把战争引向淞沪地区……以改变敌进攻方向”,这是不合逻辑的。

关于淞沪战场的地位,叶剑英当年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1937年9月5日,他作为八路军参谋长在南京国防讨论会上讲话说:当前我之防御重点在上海,虽胜利不能转移全战局;如在平绥线置重点,则可转移全战局,而破坏敌人整个计划。这里他已明确指出当时(即9月初)上海已是中国抗战的“防御重点”,虽然他对此并不赞成。这个论断必定是从国民政府的意图及战场的实际部署情况中得出的。国民政府把防御重点置于上海,当然不是“无意”的,这同在上海对敌主动进攻、向上海增兵、配置主力等等是完全一致的。淞沪抗战对整个抗战的全局影响极大。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历史,总结淞沪抗战的得失,必须抓住这些基本事实,而不可以无视、抹煞或予否定,否则就不是完全的信史了。